

# 认识论视域下对冯友兰“正负”方法论的哲学反思

葛文凤

郑州大学哲学学院, 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5日

## 摘要

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冯友兰在充分吸纳中西哲学理论精髓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构建起“新理学”体系, 在此之上提出了正负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既是冯友兰为“新理学”创建的哲学分析工具, 正底方法以逻辑分析为“新理学”搭建概念清晰的认识论框架, 负底方法以“不说而说”为其衔接“天地境界”的本体论目标, 二者共同构成其由“经验认知”通向“本体觉悟”的信念之基。而当代儒学本体论构建的关键, 恰恰在于找到能够为本体奠定基础的核心信念。因此, 从认识论视域勾勒出“正负方法”与新理学本体的内在关系, 并评析其方法运用的效果, 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其对当代儒学“逻辑清晰化”与“境界提升”双重目标的启示, 为儒学认识论重建提供新思路。

## 关键词

冯友兰, 新理学, 正负方法, 逻辑学, 认识论

##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Feng Youla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thodology: An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Wenfeng Ge

School of Philosoph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Received: April 7, 2026; accepted: April 27, 2026; published: May 15, 2026

##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 Feng Youlan creatively established the “New Rationalism” system (Xin Li Xue) by synthesizing the essential insigh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On this foundation, he propose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thods.” These methods function as philosophical analytical tools for his “New Rationalism”: the Positive Method employs logical analysis to construct an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with conceptual clarity, while the Negative Method, through “speaking through silence,” bridges the ontological goal of attaining the “cosmic realm.” Together, they form the epistemic basis for transitioning from “empirical cognition” to “ontological enlightenment.” The crux of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Confucian ontology lies precisely in identifying the core belief that can establish a foundation for the ontology. Therefore, delineat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eng Youla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thods” and the ontology of New Rationalism from an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evaluating their methodological effectiveness, can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addressing the dual objectives of “logical clarification” and “spiritual elevation” in modern Confucianism, offering fresh pathways for reconstructing Confucian epistemology.

## Keywords

Feng Youlan, New Rationalism,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thods, Logic, Epistem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目前学界对冯友兰的讨论，多集中于“逻辑分析与直觉主义”“新理学体系建构”“中西哲学融合”等论域。在此之上剖析冯友兰方法论中“逻辑清晰性要求”与“境界超越性目标”之间的张力，可促使我们思考现代哲学体系建构中的一个核心困境：在追求知识的理性化、形式化的同时，哲学如何可能不丧失其安顿生命、揭示意义的根本旨趣？

## 2. 冯友兰方法论的逻辑学引入与“正负方法”的提出

冯友兰曾在其晚年回顾中指出，其哲学生涯的起点源于对逻辑学的浓厚兴趣，并形象地称之为从逻辑学“悟入”或“打开一个缺口”([1], p. 207)。这一学术路径的开启，可追溯至其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1912年，冯友兰考入上海第二中学，该校课程多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其中一位教师将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作为英文读本使用。正是这段学习经历，使冯友兰对形式逻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对哲学的持久探索([2], p. 246)。由此可见，逻辑学不仅是冯友兰系统接触西方学术思想的媒介，更构成了其哲学思考与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石。

因为对逻辑学的天然兴趣使他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逻辑学又在他的整个哲学生涯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中，为他指引出一条哲学的近代化之路。<sup>1</sup>在冯友兰所创立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中，逻辑分析方法居于核心地位，是其体系构建的根本方法论基石与关键理论特征。这一方法不仅是其区别于中国传统哲学言说方式的重要标志，更是其“接着”而非“照着”宋明理学讲，从而开创哲学“新统”的主要工具。

想要理解冯的思想体系必然离不开其认识论方法的辨析与论证。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多以直觉、体悟为方法论核心，概念界定模糊，而冯友兰引入西方逻辑分析，正是为了破解传统哲学“概念含混”的困

<sup>1</sup>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认为“新的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他也以此区别“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哲学概念。

境。冯友兰认为：“逻辑分析方法是点铁成金的手指头。我们要的不是现成的金子，要的是能够点铁成金的手指头。” ([3], pp. 378-379) 这与中国传统观念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认识方法一贯相同。这也是当时哲学的近代化之路的迫切要求。因此，在方法论上，他先是以逻辑分析法为主，认为直觉、顿悟等经验虽有很高的价值，但“不必以之混入哲学方法之内” ([4], p. 247)。

但由于逻辑分析法无法对形而上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做进一步阐释，冯友兰刚开始提出“正底方法”和“负底方法”，所谓“负底方法”即通过说明事物的性质不是什么来表达事物性，侧重“讲形上学不能讲”，这时的“负底方法”还仅是作为逻辑分析的“补充工具”存在。直到“贞元六书”的收官之作《新知言》中，冯友兰又对负底方法做了进一步阐释，简单概括则是“正底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而“负底方法”是直觉主义的方法。在冯友兰的认识论体系中认为“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 ([5], p. 288) 其中冯友兰认为正负方法的实质，分别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以及不说它 ([6], p. 90)。这时的《新知言》明确正负方法的始终关系为“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始于正方法、终于负方法”，将负底方法提升为“通达本体的核心路径”，确定了新理学以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相结合的二元结构方法论 ([7], pp. 282-283)。

因此，冯友兰在其方法论建构中，明确区分了“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的功能与性质。<sup>2</sup>这一划分构成了其新理学体系的方法论基石。冯友兰进一步阐释了两种方法的实质：正的方法的实质在于正面讨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这构成了哲学研究的核心主题；而负的方法的实质则在于不直接言说对象本身，而是通过揭示它“不是什么”来间接表显其不可言说的本性，这种方法犹如“烘云托月”。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一种直觉主义的方法，用以触及形上学系统中那超越理性分析、不可思议言说的顶点 ([8], p. 1084)。

冯友兰致力于运用这两种方法，特别是“正底方法”所代表的近代逻辑学成就，来分析和澄清中国传统哲学中那些看似含糊不清的概念与命题。他明确指出，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应当“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糊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种做法，正是他所谓的“接着讲”，即并非简单地复述传统哲学史，而是接续中国哲学的慧命，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建构。他通过“正负”方法的综合运用，为其“新理学”体系，一个旨在融合新实在论与逻辑分析，并接着程朱理学传统而开创的“新统”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支撑，从而推动了该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冯友兰认为，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 ([5], p. 288)，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指向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一哲学的根本功用。

但这一方法论路径内部存在一种认识论张力，即“正的方法”所依赖的经验基础、逻辑形式与其所欲抵达的超验“真际”目标之间的矛盾，以及“负的方法”对“不可说”本体的指向与其必须依托“正的方法”之“言说”为基础的悖论。其学说内部的学术张力导致其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衔接出现模糊性，并直接关系到“新理学”体系与“四境界说”能否自洽地实现。

### 3. “正的方法”下经验逻辑与超验跳跃的认识论困境

冯友兰指出“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正的方法始终未曾得到充分的发展，或者应当说，它被过分地忽略了。”因此，中国哲学里缺少明晰的思考，这是中国哲学往往被视为简单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明晰的思考，哲学容易幼稚，然而“简明”本身又是一个优点。中国哲学所需要的是：除去幼稚气息，代以明晰思考。有了明晰思考，并不就是哲学的终结，它不过是任何哲学家都应有的思维训练；中国的哲学

<sup>2</sup>冯友兰在《新知言》中指出：“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换言之，“正底方法，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就是对于经验作逻辑底释义。其方法就是以理智对于经验作分析、综合及解释。这就是说以理智释经验。”

家们当然需要这样的思维训练。另一方面，人们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也看不见负的方法的充分发展。未来的哲学将在这两者的结合中发展出来。” ([8], p. 1076)这里正底方法就是要对过去哲学概念做一个的明晰的思考，这明晰思考的本身也是对西方逻辑分析法的反向应用。

冯友兰通过讲述一个禅宗的故事强调了这种正底方法的重要性，<sup>3</sup>“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告诉人，在学会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人，都必须经过使用正的方法这个阶段。在达到哲学的单纯之前，需先穿过复杂的哲学思辨丛林。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8], p. 1076)这里的“正底方法”无疑是穿过哲学思辨复杂丛林的必要工具。

但是在正底方法的实践应用上，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冯友兰经常将逻辑分析方法解读为使概念的含义明确起来的一种方法论，而不注意概念之间尤其是不注意命题之间的推导的关系。这就使得他的《新理学》一书在思想体系内部缺乏一种连贯的关系([9], pp. 41-47)。例如第一组命题“凡事物必是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 ([10], p. 147)，冯友兰从“经验事物的类属性”直接推导至“实际的理”，但“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本是经验层面的“本质属性”，如“人之所以为人者”是“理性”，而“理”是超验的“实际存在”，因为“人之理”先于具体的人而存在，二者之间缺乏经验属性如何上升为超验本体的逻辑过渡，导致推导存在明显缺口。

可知冯友兰《新理学》的形而上学建构，始于对“事物存在”这一经验事实的逻辑分析，旨在推导出“理”“气”“道体”“大全”四组形式命题。但这一方法论路径内部存在深刻张力，其一，作为起点的“事物存在”已非具体经验，而是经过抽象处理的普遍概念，其分析对象实质指向逻辑建构的“事物”类，而非原始经验材料。其二，逻辑分析在关键环节并非纯粹形式推演，而依赖于直觉理解与形上预设，其从经验命题向超验“理世界”的跳跃存在合法性疑问。其三，体系追求形式化概念明晰性与传统价值体认性之间的内在冲突，导致以逻辑分析构建的“空套子”与安顿人生境界的哲学目标之间缺乏连贯的逻辑桥梁，使得认识论进路与本体论承诺未能达成圆融统一。

冯友兰《新理学》在于为现象世界确立一个超越的、逻辑在前的形上根据。这一目标预设了“实际”与“实际”的本质分野，并试图以“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作为沟通二者的桥梁。但这一方法论路径在认识论上存在路径困境：其逻辑起点“事物存在”虽宣称源自经验，但分析对象实为经过抽象处理的普遍概念，而非具体的经验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逻辑分析的功能在于澄清概念，却无法保证能从特殊的“实际”必然地推导出超验的“实际”。例如，从“事物存在”到“所有以能存在者”的跳跃，并非纯粹的逻辑演绎，已然隐含了形而上学的预设。因此，仅凭基于经验事实的“正的方法”，难以逻辑必然地完成从现象到本体的过渡，也无法独立建构起一个完整自洽的形上学体系。这一路径困难，恰恰构成了冯友兰在体系后期引入“负的方法”并转向境界论阐述的内在动因。

大体言之，正如冯契所言：“‘新理学’的真正贡献在于它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 ([11], p. 164)。因为冯友兰正是通过“正底方法”完成对“理”与“气”的重构，比如程朱理学中“理”与“气”的关系是“理在气中”的模糊关联，而冯友兰通过逻辑分析将“理”界定为“实际的共相” ([10], p. 148)， “气”界定为“实际的质料” ([10], p. 150)，并明确二者“实际与实际” ([10], p. 153)的层级关系，使传统概念的逻辑边界首次清晰化，这正是逻辑分析的核心贡献。只是论证逻辑分析作为澄清概念的工具，其自身无法保证从特殊实际必然过渡到普遍实际，单凭“正的方法”也无法独立完成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过渡。

#### 4. “负的方法” 审视下正负方法的辩证关系

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以“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为核心方法论，旨在构建一个从逻辑分析通

<sup>3</sup>说有一位禅师，每当被问到佛教的“道”如何解释时，他便竖起大拇指，一句话不说，只是让人看他的大拇指。服侍他的小和尚也学会了这样做。一天，禅师看到小和尚也这样做，他飞快地拿刀砍掉了小和尚的拇指。小和尚哭着跑开去。这时，禅师喊他，他刚回头，禅师又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据说，小和尚就此得到了“顿悟”。

达精神境界的完整哲学系统。这一体系在方法论层面并非毫无争议，其“负底方法”的定位与功能，尤其是它与“正底方法”的内在关系，构成了理解其思想深度与内在张力的关键。

若仅从表面看，冯友兰的界定是“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12], p. 9)，似乎暗示了一种清晰的先后次序：始于清晰言说的逻辑建构，终于不可言说的体悟。但深入其思想内部，特别是结合其晚年反思与体系的内在目标，可以发现“负底方法”并非仅是序列的终点，而是贯穿并奠基整个哲学活动的根本指向。对这一关系的澄清，是把握“新理学”如何弥合“知识”与“境界”实现其哲学目标的核心。

冯友兰对“负底方法”的经典表述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这常被理解为在逻辑分析穷尽之后，对终极本体的一种沉默的、直觉的指向。但若“负底方法”仅是一个阶段性的、补充性的终点，那么“新理学”体系将面临一个严峻挑战：以形式化、逻辑化构建的“空套子”，如何必然地、内在地引导出充满价值内涵的“天地境界”？这中间可能存在断裂。

事实上，冯友兰的论述揭示了“负底方法”更根本的作用<sup>4</sup>。这意味着，哲学活动本身，始终是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的“思议”与“言说”。负的方法并非在正的方法结束后才启动，而是作为哲学思考的根本目标与内在动力，从一开始就萦绕并引导着正的、逻辑的言说。正的方法所进行的逻辑分析、概念澄清，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客观知识，而是为了“表显”那个无法被正面定义的本体，从而“提高人的心智”([8], p. 1077)。因此，“负底方法”是哲学活动的“本”，即形而上学目标的根本指向，它规定了正的方法的意义方向([8], p. 1077)。

以此言之，正负方法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外在先后衔接，而是一种内在的、辩证的统一过程。这一过程在冯友兰的思想发展中，也体现为一个从侧重“建构”到追求“融通”的演进。

在“新理学”体系创立初期，冯友兰的工作重心在于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从“事物存在”这一经验命题出发，进行“形式的释义”，推导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纯粹的形式观念。这一阶段，他特别强调哲学概念的“形式性”与“空灵性”，以区别于对“实际”有所肯定的科学，并回应维也纳学派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9], pp. 41-47)。此时，“负底方法”虽在理念上已被承认，但在体系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尚未完全凸显，其与正的方法的融合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论上的设定，即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

这种侧重形式建构的进路，虽然使体系获得了逻辑清晰性，但也带来了内在张力。有学者指出，这导致了“逻辑与事实的矛盾”，以及“形式抽象的哲学”与“人生意境的哲学”之间的潜在脱节。冯友兰本人晚年也通过“具体共相”的观念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识到，哲学概念固然具有形式性，但并非毫无内容的空壳。它们作为“把握实在的方式”，本身蕴含着“特殊内容”([13], pp. 221-222)，是意义揭示的思想创造活动。这一反思至关重要，它意味着“理”“大全”等形式观念，并非与人生境界无关的逻辑符号，其“形式性”恰恰是为了承载和通向最丰富的“精神内容”。通过“觉解”这些观念，人才能实现境界的提升。晚年反思表明，正的方法所建构的形式概念，与负的方法所指向的境界，在“具体共相”的观照下实现了内在统一：概念是境界的理性导引，境界是概念的终极实现。

“新理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境界论”，使人通过“觉解”达到“天地境界”，即“自同于大全”的精神状态。正负方法的辩证统一，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论桥梁。“天地境界”并非反理性的体验，而是“思议了解的最高得获”([14], p. 638)。要达到此境界，必须首先通过正的方法，对宇宙、人生进行理智的分析与了解。冯友兰的四组命题和四个观念，为人们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理性的、形式的框架。例如，理解“大全”作为“至大无外”的宇宙全体观念，是迈向“自同于大全”境界的必要理智准备。没有

<sup>4</sup>冯友兰在《新理学·绪论》中指出：“对于不可思议者，仍有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仍有言说。若无思议言说，则虽对于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有完全底了解亦无哲学。”

这个清晰的理性建构，境界的提升便缺乏思想的基石。

但仅凭逻辑分析无法直接“进入”境界。当理智思议推进至“大全”这样的概念时，便会触及自身边界——思议“大全”者本身被包含在“大全”之内，形成逻辑上的悖论，从而昭示了“不可思议”的领域。此时，负的方法的作用便凸显出来。它不是抛弃思议，而是引导主体从“思议‘大全’”转向“体认自身在‘大全’之中”，从对象化的“知”转向存在化的“悟”。这正是“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的真义，思议其不可思议性，从而实现认知模式的根本转换([14], p. 638)。唯有通过负的方法的这种“烘云托月”式的表显，正的方法所建构的理性概念，才能转化为照亮生命、提升精神境界的活的力量。

因此，在冯友兰“新理学”的成熟构想中，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的方法以逻辑言说构建清晰的概念框架，负的方法则以“不说而说”赋予此框架以通向终极本体的意义指向。二者共同服务于哲学的根本任务：“为了提高人的心智”，成就人生的最高境([8], p. 1077)。哲学因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意义揭示活动”([8], p. 1077)，它始于对经验的理性分析，却始终以对超越理性的终极实在的指向为内在动力，并最终在精神的跃升中实现其价值。

冯友兰的方法论探索，不仅是对中西哲学方法的一次创造性综合，更是对哲学本身何以能够既保持理性清晰、又安顿生命意义的深刻回答。尽管其体系在具体建构中可能存在表述或衔接上的“破绽”([15], p. 28)，以及这一调整本身的理论清晰度与必然性仍是需要审视的问题。但其围绕正负方法所展开的、试图贯通逻辑分析与生命境界的核心理路，展现了一以贯之的思想努力与深邃的哲学智慧。

## 5. 反思与结语

冯友兰的“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论，旨在构建一个从逻辑认知通达生命境界的哲学桥梁。正的方法源于西方逻辑分析，侧重于对“可说的”概念与命题进行清晰界定与推理。负的方法则承继中国哲学传统，指向对“不可说的”本体与境界进行直觉体悟与暗示。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具有互补性，但在内在理路上存在内在张力：逻辑分析要求明确与实证，而直觉体悟则倾向于超越与含蓄。冯友兰通过“四境界说”作为中介，试图统一这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引导人从“自然境界”经“功利境界”达至“道德境界”，实现知识层面的“觉解”。负的方法则进一步引领人从“道德境界”跃入“天地境界”，实现本体层面的“觉悟”。这一架构体现了其融合中西、贯通知识与意义的深刻努力。

但这一整合在逻辑衔接上仍存在模糊地带。正的方法如何必然地导向负的方法，负的方法又如何确保其体悟不流于主观玄虚，在体系内部并未得到充分清晰的论证。“四境界说”在功能上成为方法统一的落脚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方法论层面未能完全弥合的缝隙。尽管如此，冯友兰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他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使其在保持境界追求的同时，吸纳了逻辑分析的清晰性；他亦揭示了哲学的根本任务不仅在于求知，更在于提升人的生命境界。

这一探索对当代哲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在现代学术追求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背景下，哲学不应丧失其关照生命意义、安顿精神世界的传统旨趣。如何在“知识的清晰性”与“意义的生成性”之间保持平衡与贯通，是当代儒学乃至一般哲学建构面临的重要课题。冯友兰的“正负方法”论及其境界哲学，为我们思考理性分析与生命体验、逻辑认知与精神超越之间的永恒张力，提供了宝贵的理论镜鉴与实践参照。

##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 中国现代哲学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207.
- [2] 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M]//《三松堂全集》第1卷.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246.
- [3]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378-379.

- 
- [4]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三松堂全集》第2卷.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247.
- [5]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三松堂全集》第6卷.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288.
- [6] 冯友兰. 贞元六书: 新知言[M]//《三松堂全集》下.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90.
- [7] 李晓帆. 冯友兰新理学“负底方法”探析[J]. 国际儒学论丛, 2021(1): 72-83, 282-283.
- [8]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赵复三,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 [9] 胡军. 逻辑分析方法的中国式解读(上)——以冯友兰为核心[J]. 学术月刊, 2010, 42(2): 41-47.
- [10] 冯友兰. 新知言[M]//《三松堂全集》第5卷.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147-153.
- [11] 郑家栋, 陈鹏, 选编. 解析冯友兰[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12] 冯友兰. 《贞元六书》上[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1996: 9.
- [13] 李景林. 正负方法与人生境界——冯友兰哲学方法论引发之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6): 66-79, 221-222.
- [14] 冯友兰. 《贞元六书》下[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1996: 638.
- [15] 冯友兰. 南渡集[M]//《三松堂全集》第5卷.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28.